

闲 堂 自 述

程 千 帆

一 家世与经历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系我曾用诸笔名之一，现在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8月21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家境清贫，但数代以来即有文学传统：曾祖父名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婆家度过的。1923年前后，因军阀混战，在长沙不易谋生，我家迁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家里。在武昌住了五年，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伯父名士经，是子大叔祖的长子，以早慧知名，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他是我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启蒙老师。1928年秋，我赴南京，考入金陵中学初中三年级，从此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避难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就在那里和沈祖棻结婚。1938年春，辗转回到长沙，在益阳龙洲师范学校教了一个多月的书，又因生病离开。其后，为了逃避日寇及糊口，曾流转于武汉、重庆、康定等地，在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任一小职员，直到1940年才重回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担任国文教员，生活稍为安定。可是因种种关系，工作单位仍屡次变迁。1941年到1945年，先后任教于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大学，一直延续了三十二年。

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到1975年才摘掉帽子，而得到彻底改正，又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摘帽后，我就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1977年，沈祖棻在一次车祸中逝世，又给我一次极大的打击。在划为右派分子的十八年中，参加过各种繁重的劳动，承受着难堪的侮辱。这些，我并不怎么在意。所感到惋惜的，乃是在我年富力强，学问稍有基础的时候，工作机会却长期被剥夺了，以致一生成就很少；否则，也许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出一些贡献。

1978年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聘请我这已经六十五岁的街道居民为南京大学教授，从而开始了我新的学术生涯。翌年，和陶芸结婚。在初到南大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夺回失去的时间。十二年来，我带出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著作、编辑、整理了十多部书籍。在还想继续前进的时候，年龄已达七十七岁，心脏病更使我精力日衰，便在1990年5月退休了。对于没有能全部夺回被浪费了的时间，我始终感到很深的遗憾。

二 学习与师承

我所受的教育可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在君硕伯父办的私塾

“有恒斋”里专门读古书，后一段是在现代大中学校里研习各种课程。1923年到1928年在武汉，先后两次随伯父读书约三四年，同学十余人都是同族兄弟和少数世交。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虽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学习的起点很高。他认为当时一般私塾常读的《古文观止》等书都是俗学，而教我们学习的则是为打好国学基础所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因此我那时就通读了《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显然并不可能全然了解），作为正课。此外还浏览了许多书籍，甚至象吕坤的《呻吟语》、陆陇其的《松阳讲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家书》、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之类，也曾认真看过。每天写大小字，作日记，每周作文，也有严格规定。这几年的学习是刻苦而乏味的，同时是有益的。它成功地培养了我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并使我初步接触了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当然其中也有糟粕）。这对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好处极大。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多方面接触了现代科学。进入金陵大学以后，除以中国文学为专业外，还读过文学以外的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外历史）以及文科以外的数学、生物学等课程。这种安排不仅使自己的知识更为丰富，思想变得开阔，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进而具有带实证性的理解。我认为很有意义的。

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过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有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便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的课时，一个学期就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

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了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现在张、黄两先生已逝世了，林先生还健在，我祝福他健康长寿。

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知（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我便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五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我同样祝福他健康长寿），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八十的白发门生脑中。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确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斟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我在几个大学工作期间，也有几位同事是我所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四川大学的赵少咸（世忠）先生、庞绶（俊）先生和武汉大学的刘弘度（永济）先生对我教诲、提拔、鼓励是多方面的：我有问题请教他们，无不获得详尽的解答；稍微做出一点成绩，都获得过分的奖饰。他们的指导使我在各方面都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原有的知识。在同辈中，殷孟伦、徐复、孙望、陈孝章、刘君惠、周勋初诸先生，还有沈祖棻，也都是生平畏友，益我甚多。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受哪个老师的影响最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其长处，而他们的长处我都想学到，虽然事实上，我也明白，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杜甫“转益多师”之说，确是颠扑不灭的道理。

三 学术次第与著述

衡如先生给学生讲授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雠学。他首先强调这门学问作为治学门径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意义。我信受奉行，所以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我认真学习过由《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诸家著作，后来并长期讲授这门课程。在这方面，除发表过若干单篇论文外，我和弟子徐有富合著了《校雠广义》一书。该书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第一次全面地概述了自西汉刘氏父子创建，历代学者共同发展，至清儒而益臻完备的这门我国独有的自成系统的科学。现在版本、目录两编已经脱稿，余两编在撰写中，希望早日完成。

文史兼治，是我国古典学术的优良传统。文和史，源合流分，又始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我的家学和师承使我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贯文史并重。发表的著作虽以文学为多，但这些研究文学的著作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之上的。当然，我也注意到了，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

早在四十年代，我就曾对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两书，下过较大的功夫。对于《史通》，我有《史通笺记》一书问世；对《文史通义》，也曾详注数篇，后为亡友叶瑛教授《文史通义校注》全部收入。对于这两部书的钻研，增强了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识，提高了自己的思辨力。

我在文史兼治方面的另一实践是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了综合研究，比较深入地考述了唐代进士在考试之前行卷这一风尚及其与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对于史学来说，这属于科举史的范围，而对于文学来说，则可以归入背景研究吧。友人傅璇琮教授在我出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个小册子之后，写出了非常全面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其成就远远超出了拙著。

因为长期担任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课程，我曾编写过几种讲义；但正式出版的，只有近年与吴新雷教授合作的《两宋文学史》一种。在结构的安排与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它与其它同类作品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显示了我们不完全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那种将文学发展史理解为文体变迁史的简单化说法。因此，在叙述宋代文学时，不但较为详细地写了有关戏剧、话本部分，而且也没有忽略当时的传奇和四六。

我还始终认为，叙述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文学史与叙述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文学理论史（或批评史）不应当是相互隔绝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同步发展的。研究

文学历史的人，不能不将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反之亦然。由于是这样理解问题的，所以我研究、讲授文学史，总是注意那些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我还曾短期讲授过古代文论这门课程，并笺注了十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四十年代末，出版了一部包括所注《文史通义》数篇在内的名《文论要铨》的书（重印时，改名《文论十笺》）。

在我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以在古典诗歌方面花费的时间最久，用力最专。诗本是我的家学，先辈能诗有集的人不少，已见前述。先父穆庵先生，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顾先生的诗集就是先父编印的。先父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我关于诗方面的著作可分两类：一是评选，二是论述。选本从晋宋以来，便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它标举篇章，评量优劣，指示风尚，区别异同。我因讲授历代诗选、专家诗（主要是杜诗），曾不断地对前代名篇进行选择、评论和注释。已出版的，有《宋诗选》（与亡友缪琨合作）和《古诗今选》（与先室沈氏合作）。此外，为了探讨中国文化对邻邦的影响，曾与亡友孙望教授共撰《日本汉诗选评》一书，以介绍日本历代汉诗作者的高度成就。

上述这三部书对诗篇的选择和评注，表达了我对古典诗歌的某些观点和理解，我对它们的历史认识和审美情趣。但我对诗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用论文形式发表的。除了在《两宋文学史》中对宋代诗词作了概略的叙述外，还有《古诗考索》、《程千帆诗论选集》及《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三部论文集。前两书分别有周勋初教授及弟子张伯伟所写后记，《诗世界》专论杜诗，是我

与弟子莫砺锋、张宏生合撰的，也有他们写的后记。这些后记对三书内容及使用的方法都有所评述。

大体说来，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在过去，人们大都认为：文学事业，应当知能并重。所以诗论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诗人，而诗人对于诗当然也都有其各自的见解，虽然这些见解没有能全部流传下来。严羽是位有成就的诗论家，他的诗存下来的为数不多，却是很优秀的。伟大的李白和杜甫给后人留下辉煌的诗篇，而他们对于诗歌的精辟见解也是人所共知的，不可忽视的。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其独特的感发；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单靠理性思维，不但无法作诗，也难以对诗有真知灼见。当然，如果只凭感情，也是无法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基于这种感与知在心灵活动中互相依存渗透的不可分性，以及文学史上诗论家无一不能创作（当然其成就大有高低）这一事实，我多年的认识和体验是：从研究角度来说，创作实践愈丰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

正由于此，在我多年来研究诗也为学生讲诗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我的创作。抗日战争以前，和汪铭竹、滕刚、常任侠、孙望等结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可惜这个小小刊物由于战争爆发而停顿了。其后几年也还

在写。四十年代起，以教授古典文学为职业，于是又将多年搁笔的古体诗拾了起来。写诗寄托了我的悲欢，也深化了我对古代诗人的理解。十年浩劫，诗稿丢失大半，反复记忆搜集，还存了近二百首，现编成《闲堂诗存》一卷，附在《诗世界》之后。自跋说：“才地既弱，格局亦小，过而存之，聊以自道其哀乐，诗云乎哉？”这是实情。但我希望有人知道，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但我既做了半个世纪的教书匠，自不免和青年人多所接触，谈过不少问题。陶芸将其中有关如何做学问的一部分辑录下来，出版了一本名为《治学小言》的小册子。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聊供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以上，就是我七十余年生命旅程的大体情况。少年时既然不够努力，中岁又以非罪获谴，浪费了很多时间，虽希望“收之桑榆”，而终苦“臣精消亡”，以致所为远不及其所当为，所得远不及其所欲得。回首前尘，只剩惭愧而已。1990年7月记。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